

那些年，射击都教了我什么

蒋在

和透着牛皮的背带混合着不同人心手的汗味透出的一种既机械化又庄严的气息。就像我们训练的场馆上写着“为荣誉而战”。这总让看到的人为之热血沸腾，好像穿上那身衣服你就不再代表自己了一样。

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延续至今，也是源自于人类基因中对竞技的热爱，对拼搏与自豪感的向往。

过去人们相信奥运会的传承是因为人们将这种竞技的形式，当做一种“虚假的战争”，人们在此种厮杀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也不过仅仅是在“游戏”的范畴内而已。然而，细读《荷马史诗》会发现，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盛事的延续是因为它是葬礼上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人类以竞技的模式向神展示露人的力量，安抚逝者不安的灵魂，以及通过比赛来重新凝聚人民因逝者离去而松散的内心。

射击不是一项传统的奥林匹克运动，它1896年才正式成为一项比赛项目。

在所有运动中，我最喜欢射击。射击是一项孤独的，和自己竞技的运动。每一刻你都比上一刻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

调整好站姿，那个重达五公斤的射击服让人在里面难以晃动，就像负重前行的沙袋，你会很结实地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拖着你不坠，仿佛把你的双脚钉在了地上。我必须得在里面穿着单薄的衬衣，才能保证此种纤细让我对这套沉重的衣服产生某种联结，或是掌控感。接着是肩膀，我要通过肩部的支撑和余热去感受和温暖那块冰冷的金属。

低下头，闭眼调整呼吸和心跳。装弹以后，你要全身心地觉察这把枪在你身上的存在，你甚至要尽力去想象它变成了你身体的一个器官，你必须懂得如何运用它，让它成为你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对于其他运动员来说，是不是也有相同的体悟：乒乓球拍、羽毛球拍或者击剑项目，他们是不是也将手里的物体想象成为自己身上的某一器官，感受到它的温度和跳动才能更好地驾驭它呢？

子弹射出的速度很快。但我往往会等到听见那清脆的穿过靶纸的声音，才会松弛姿势把枪取下。教练对我的技术并不担心，但是不止一次地说过我要调整好心态，不要看别人打多少，打到第几发子弹，只管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比赛那天，我的枪在刚开始那几发子弹就没有调试好，我不得不根据瞄准器或许有些朝左的偏差，微调我的射击范围，结果比赛正式开始第一发子弹就打出了五环的成绩。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知道比赛到此就结束了。我只感受到那个空旷、暗淡的射击场馆，每一个位置都站着一个正在瞄准的运动员，偌大的场馆里几乎没有嘈杂的说话声，有的是不停地放入铅弹，扣动扳机的声音，以及靶纸在坚硬的纺织线上被穿孔的声音。

我感受到比赛的残酷。背后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被那些数字磨灭。最后那场比赛，20发子弹我只打出了175环的成绩。还没有等成绩完全公布，我就离开了比赛场所。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成绩在省里根本排不上名次。

那是我最后一次拿起气步枪，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幻想就此破灭。之后的日子，在每一次人生的抉择，每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我都记得当时教练给我说的那句话，必须调整好你的呼吸，三十秒之内，发射出那枚铅弹，如果没有准备好，你必须放下你的枪。

如今作为射击运动员的我，已成为平行时空里的过去式可能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发现我能成为的事物越少。我不知道早年的体育经验有没有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滋养，如果有的话，我想一定是学会在人生的长跑之中，如何调整呼吸。

在准备贵州省射击锦标赛时，我不得不暂时停下一切其他的运动，全身心地准备比赛。那时候每周我还有网球课，后来在训练中发现网球挥拍这一动作在无形中影响了手腕的稳定性，网球课也不得不终止。

平时训练时，我们需要在场馆排队领枪。门边坐着一位男老师，登记我们每一个人的姓名，取枪和还枪的时间，包括我们枪支的型号。仓库有几把老式步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老式的峨眉EM45B型气步枪。它的装弹方式、重量和外形，都和我们比赛时的用枪不同。

我的训练服是深蓝色的。我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只能按照自己的身型选择一套适合自己的服装。在比赛服后面上自己的名字避免拿错。我的训练服上有一些褶皱，用白色和蓝色的线条装饰。看起来干净利落，像要随时登月的宇航员。

衣服闻起来很像装枪支的布袋，有着粗麻和尼龙的布料浸进油里又晾晒干的的味道。那或许是边角磨损得光滑

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更不用说外公这样更上一辈的老祖宗了。

对此，我从来没有遗憾过。尤其是长大以后，知道我母亲当年是决绝地斩断自己和封建大地主家庭的一切联系，义无反顾地跟着共产党，参加了新四军，而后又战斗在我党地下交通站线上，再也没有回家。我还挺敬佩母亲的。

直到有一天，母亲突然破天荒地对我说了她的家乡渔家渡，说起了以前从未对我提及过的，我的太外公董金鑑，我才发现，我对自己的老祖宗是太不了解了。

母亲在1921年末，生于浙江上虞小舜江边渔家渡“董久大”台门里；我的太外公，也就是母亲的爷爷董金鑑，则于1922年初秋，逝于沪上英租界内梅白克路“久大”商行附近一栋老式公寓内。按说母亲和自己的爷爷董金鑑并无什么交集，为什么她会在多少年后，对这个从未谋面的爷爷心存敬意和怀念？

“久大”是高祖董簧山早年在上海创建的一家经营丝茶的商行，因生意红火，又接连开出钱庄、当铺，钱财滚滚而来，便回乡在小舜江两岸大举买田置地盖房，从此富甲一方、声名远播，“董久大”的名号也由此而生。

董簧山生意虽旺，却无子嗣，难免伤感。好在自家兄弟董南山的儿子董金鑑聪明伶俐，承欢膝下，董簧山对他视如己出。同治六年，董簧山过继董金鑑为嗣子，时年小金鑑刚满六岁。董簧山给董金鑑取字“竟吾”，含有古人“继承先人志向，传承先人事业”之意，希望他好好读书，将来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董金鑑不负高祖厚望，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十七岁时便中了秀才。后因身体羸弱，母亲吴太夫人恐他苦读伤身，劝他别着急科举。董金鑑虽然遵母命，暂且放下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但苦读家中高祖多年购买的藏书已成习惯，一颗心早已浸淫书海，无法自拔。

后来，“董久大”创始人董簧山和其兄弟南山、灏山相继去世，而六岁时就过继给董簧山当嗣子的董金鑑，虽然本无意经商，但作为董簧山的继承人，他不得不听命，接过了掌管家族生意的重任。

其时董金鑑才二十四岁，便无奈断了读书人的梦想，彻底放弃科举之路，一脚踏入了商海。

董金鑑接替祖上生意后，虽然主要精力放在了打理家业上，但读书、购书、藏书、做学问，仍然是他的挚爱。

母亲第一次对我提及渔家渡和董久大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太外

公董金鑑在做生意的同时，创立的三山义庄中的藏书楼。

董金鑑为藏书楼取名：“取斯堂”。“取斯”二字源自唐代诗人李绅作的那首《寒松赋》，全赋274字，极赞长在冷崖峭壁的寒松，虽不被人识，依然高峻挺拔，特立独行，不改变自己的内心，表现出隐士君子的志趣和气节。最后以“固斯焉而取斯”一句结尾，句中的“取”有“取法”之意；“斯”指寒松，董金鑑曾有个别号叫“小舜江渔隐”，他为藏书楼取名“取斯堂”，是否暗喻做人要像寒松那般隐于深山，却不失自己的志趣、气节和风骨？

随着年龄渐长，董金鑑对经营生意心生倦怠，却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对书从喜欢到酷爱，以致嗜书如命。他开始大量收集各种版本的书籍，有时看到心仪的书，书家不肯出手，他会几次三番上门软磨硬泡，加价收购；有时打听到谁家藏有珍稀古书，他更是不惜代价，辗转托人寻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最终还是有不少珍稀版本的书籍和一些家传渊源的古孤本他无法求得，于是便四下寻找书法俊逸秀美的“佣书”（受人雇佣以抄书为业的人），出重金聘请他们对而不得的书进行抄录。但凡看到有价值的善本、孤本，或对民众有用的医方等等，或民间郎中独门秘籍的草药偏方等等，他更是不惜钱财，翻刻付印，收藏保存。

如今被绍兴图书馆收藏的《竟吾随笔》就是董金鑑亲笔所书，内中记载了大量他寻书、购书、请人抄书的种种细节和过程。

天长日久，“取斯堂”藏书已洋洋大观。董金鑑热衷购书、抄书、刻书、校书、印书、藏书的名声也渐渐传开，声誉日隆。许多爱书之人纷纷登门造访，切磋交流。清末绍兴最著名的藏书家、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的创始人徐树兰，不仅成了董府常客，他的堂侄徐维椿，后来还成了董金鑑的大女婿。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和董金鑑也因书结缘，成为好友。后来董家因故遇劫，蔡先生还伸出援手施救。此后后话。

董金鑑曾经在为母亲撰写的《吴太夫人年谱》中提及自家的藏书：“积书至万千”，万与千的前面都空着没写，

说明他虽然对其家中的藏书尚未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但藏书已经以万计，却是确凿无疑的，且绝大多数都是上品、珍品。

2012年，绍兴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鲁先进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会稽渔渡董金鑑藏书刻书考略”的论文，其中对“取斯堂”的藏书数量进行了探讨。文中写道：“取斯堂”是颇具规模的藏书楼，必然有《经、史、子、集》四部分藏书，“取斯堂”遗稿中恰好保存了一份“经部藏书目录”，列出的数目竟然多达万卷以上。由此推断，“史”“子”“集”三部藏书，每一部至少在万卷以上。四部藏书的总数虽难以说出准确数字，但说它在五至六万卷之间，应该不算过分。

我想，太外公当年在上海梅白克路公寓里去世时，心中最放不下的，恐怕就是渔家渡“取斯堂”内的数万卷藏书吧？

母亲告诉我，“取斯堂”是一栋九楼九底的房子，每间房子大约都有三四十平米，里面全是顶天立地的楠木书柜。那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封建大家庭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母亲在二十岁之前一直没有上学的机会，唯一能让她在书本和文字中汲取知识和学问的，就是“取斯堂”了。

“取斯堂”的一排排楠木书柜在母亲眼里顶天立地，每个书柜大约都有两米多高，1.2米宽，30—40公分深，层层叠叠堆满了书。母亲觉得好看的书一般都摆放在高处，她要用梯子爬上去找书、取书。爬上去了，母亲就不肯下来，坐在高高的梯子顶端看书，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有时候连吃饭都忘了。

有段时间母亲头上得了痔疮，被剃光了头发，家里人上上下下都喊她“癞头婆”。母亲顶着一颗西瓜脑袋羞于见人，“取斯堂”就更成了她的避风港。无缘上学的闺阁千金也因此有了读书的机会。我问母亲，这是否就是你挣脱封建大家庭藩篱参加革命多年后，仍然会怀念“取斯堂”和它的创建者董金鑑的原因？

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却给我讲述了一段往事。

1941年，日本鬼子占领了绍兴城。不久，以书香闻名会稽的董久大

遥远的“取斯堂”

袁敏

三山义庄内的“取斯堂”藏书楼，就遭遇了一场劫难。

那一天，四条大船停靠在董久大河埠头。船上下来了大约二三十人，为首的是两个穿便服的日本人，旁边跟着翻译。随行中有几个穿长衫的文人，脸上透出无奈和恐惧。其余的人个个身强力壮，裸露凶光，身上斜挎着驳壳枪。

他们闯进董府，说要找董久大管事的人说话。董家其时辈分最大的就是二爷爷渠清公了。翻译对二爷爷说：日本人要买你家藏书！二爷爷壮着胆子说：祖宗留下来的书我们不卖！旁边一位粗鲁凶拔出驳壳枪顶着二爷爷脑袋吼道：日本人要买，你们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否则，一把火烧了你全家！二爷爷哪见过这种场面，当场吓得小便失禁，索索发抖。这帮人丢下二爷爷，径直去了三山义庄，直奔“取斯堂”。义庄的人见了这等横冲直闯的架势，哪敢阻拦，只好任由他们去了藏书楼。

那几个文人都是书界行家，是被日本人逼迫前来挑选书籍的。凡孤本、善本、精本，尤其是宋版、元版、明版的珍贵藏书，都被他们一一挑出，让随从人等去船上抬来木箱，小心装入箱内，抬到船上。由于书实在太多，这些人整整折腾了好几天，装满了四条船运走。临走时，日本人随意丢下了一些钱，算是“买”，不是“抢”。

“取斯堂”那一次的横遭劫难，在母亲心中种下了深仇大恨。她知道，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国之不存，何以家为？

也就是在那一年，母亲遇到了共产党组织派来渔家渡建立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的父亲，他的公开身份是渔家渡小学的教师。父亲登门拜访统战对象“董久大”时，母亲不失时机地向家人提出要去上学。家人碍于父亲的面子，只好答应了母亲上学的请求。

20岁的母亲第一次跨进校门，也从此跟随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

但走得再远，“取斯堂”的身影，其实一直珍藏在母亲心里。

2023年10月2日，102岁的母亲走完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与世长辞。

为了撰写母亲的一生，也为了追寻自己以往并不真正了解的“董久大”的真实故事，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和遥远的“取斯堂”对话，我不仅想追踪那四船被日本鬼子抢走的珍贵藏书的下落，我也想看到如今被绍兴图书馆收藏的“取斯堂”剩余部分的藏书。

遥远的“取斯堂”，你的亲人在找你！



左：渔渡牌坊旧照。右：小舜江旧照。



巴黎行记

去奥赛发现美的奥秘

张生

在夏天的烈日和巴黎特有的蓝天下，很远就可以看到塞纳河对岸的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两个高耸的塔形屋顶的大钟，而这个由1900年建成的火车站改建而成的美术馆有着漂亮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的赭黄色的石头立面，有着一一种沉静的古典美，而两个塔楼间的七个巨大的拱形落地玻璃窗户，又透出一种轻盈的现代气息，似乎要让这石头的建筑里面看不见的空间变得透明起来。

博物馆门前排队的人不算多，可没想到博物馆里的人却有如此之多。在拱形的玻璃天棚之下，竟然有着数不尽的人流，几乎每个展厅的入口处都有人进出，而在中央楼道和两侧的廊道摆放的雕塑前，也都有着无数的人在拿着手机拍照，在各种喧哗声中，这种热闹非凡的景象给人的感觉似乎不是来到了博物馆，而是忽然间重新回到了这座昔日的火车站的人来人往的站台。

女性生殖器本身就给人一种色情意味，所以观看行为还需要给予一种超越日常道德的力量才能完成。而与与此同时，就在这种超越道德的观看之中，“世界的起源”这幅作品的意义也才能“诞生”或者完成。

波德莱尔在《1855年的世博会》一文中曾言，“美总是古怪的”(Le beau est toujours bizarre)。“bizarre”这个词有“古怪”，“奇怪”的意思，但它还有让人震惊、不愉快，感到被冒犯或者亵渎，甚至因此让人生气的意思。而这正是美的奥秘所在。也就是说，美要给人一种古怪或奇怪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不仅要让人感到不可接受。但是，对于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的直接以一个女性生殖器的写实为画作的主体来说，虽然以女性的生育之门作为世界诞生的源泉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幅画无论是对于“眼”来说，还是对于“心”来说，都可能太过于“暴力”了。因为这幅画给人以突破道德禁忌的挑战——这种观看

许正因此，据说库尔贝曾自豪地说，他的这幅画所创造出的美是提香、拉斐尔等古典画家所没有创造出的一种美，一种现代的不以之前的美为美的新的美。

当然，这种古怪和冒犯，既有艺术形式的古怪，也有艺术内容的古怪，更有艺术原则的古怪。印象派对光与色彩的处理的古怪，波普艺术对现成物的处理的古怪，还有杜尚的把小便池签名后搬进美术馆的打破艺术标准的古怪，都是例证。惟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当年因为被人认为“有伤风化”而不能上巴黎沙龙展，也可以理解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直到1988年才得以在纽约展出，又到1995年才在奥赛展出。但从此以后，这幅画就一直成为奥赛经常引发争议的作品，近年来最让人“震撼”的就是2014年卢森堡女艺术家黛博拉(Deborah de Robertis)在《世界的起源》这幅画前以自己的身体现场“活化”

了这幅画，创造了名为“起源的镜像”(Miroir de l'origine)的作品。然而，此举虽然是艺术创作，同样也引起了骚动，最后她被保安带走。

而有趣的是，1955年拉康和妻子希尔维亚·巴塔耶曾通过拍卖收藏了这幅画，把这幅画放在他的乡间别墅之中，每当有密友前来，他都会将其作为会见的高潮，展现在朋友们面前，据说毕加索也曾有幸幸睹，大受刺激后立刻就产生了创作冲动，不过他很可能后来在自己的画作中将其立体变形也未可知。不过，也许这幅画的“力量”过于强大，就是拉康也感到难以招架，他请姐夫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 1896—1987)画了一幅《色情之地》(Terre érotique, 1943)放在前面，以减弱其“火力”。据说，这是超现实主义版本的《世界的起源》。我已经在蓬皮杜看过，但其冲击力与库尔贝的原作比起来，显然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也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拉康的朋友、希尔维亚的前夫、马松的哥们儿巴塔耶对美的看法：美就是一种越界行为，美就是要扎眼又扎心。

我离开奥赛之际，在门口的纪念品店里买了个昂贵的帆布袋，因为上面就有波德莱尔的那句话：“Le beau est toujours bizarre。”

美总是必扎尔的。

2024年6月29日，匆草于11 Rue Beaugrenelle。

